

传统铁器时代中西方文明的 差异化发展

Different Development of Chinese and Western Civilization in the Traditional Iron Age

供稿|毛卫民^{1,2} / MAO Wei-min^{1,2}

内
容
导
读

约公元前 1000 年世界各地逐渐进入传统铁器时代。当时，中华文明已有约 2000 年的发展历史，并借助发达的铜器技术以及“融合”和“统一”的特征而逐渐走向强盛。其时，西方文明则出现仅约千年，随后借助领先于周边地区的制铁技术以及对外的“扩张”和“征服”而强盛起来，进而建立起基于对奴隶盘剥的强大奴隶社会。中西方文明的这些早期历史特征在传统铁器时代得以不断延续。在中华文明众多的早期思想学派中儒学得以脱颖而出并不断完善，成为持续两千多年社会稳定的主流意识；但其僵化、守旧的消极作用却阻碍了社会的快速进步和发展。中华文明的融合特征也使其主体民族并未实施过对异族的大规模种族灭绝行为。推行对异族盘剥而非融合的早期西方文明难以长期维持覆盖全欧洲的庞大统治，致使西罗马帝国最终灭亡。在随后上千年的中世纪时期，基督教文明成为了西方众多王国核心思想意识的基础。基督教主张平等、博爱，但这种理念并不能跨越文明圈，因而西方继续以对外扩张和征服的形式表现出对文明圈外异族的歧视。中世纪晚期的基督教极为僵化、腐败，阻碍了科技发展，因而在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启蒙运动的冲击下逐渐呈现衰落趋势。随后西方社会的政体改革、科技创新、海外扩张等行为为工业革命奠定了基础。西方文明的对外扩张、征服特征还导致了西方社会对待文明圈内外事物的双重标准，以致历史上经常发生大规模的种族灭绝行为。事实证明，当今世界已经没有早年西方借助扩张和盘剥而强盛的国际环境，无视西方价值观的双重标准，表面化地简单照搬西方制度已无法再现西方的辉煌。

初入铁器时代的中西方文明

历史文献记载，西亚的赫梯人在约公元前 16 世

纪最先发明了块炼铁技术，并制成了铁质兵器^[1]。随后，冶铁技术逐渐向西扩散，经希腊(图 1(a))、意大利传向欧洲。中国目前发现最早的用人工冶铁技术

作者单位：1. 内蒙古科技大学，内蒙古 包头 014010；2. 北京科技大学，北京 100083

制作的铁器是在甘肃临潭磨沟遗址发掘到的约公元前 1400 年经人工冶铁制作的铁条和铁块 (图 1(b))^[2]。由于人类比较容易在驻地附近地区获得铁矿石^[1], 只要发展出适当的高温技术就可以不断地生产各种铁

器。随着铁器使用的逐渐普及, 人类进入了铁器时代。一般来说, 自约公元前 1000 年至工业革命前 18 世纪初期的两千多年时间阶段可认作是人类的传统铁器时代, 在此之后则称为钢铁时代。



图 1 中西方早期铁器: (a) 约公元前 1200 年希腊迈锡尼地区铁刀^[1]; (b) 约公元前 1400 年中国甘肃临潭磨沟遗址铁块^[2]

随着冶铁、制铁技术的成熟及铁器使用的普及, 中西方均步入了传统铁器时代。铁器广泛地在农具、建房和木器加工工具、兵器等各个方面得到

越来越多的应用 (图 2)^[1]。然而, 中西方的铁器技术水平和推广应用在当时社会发展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却存在显著差异。



图 2 传统铁器时代早期中西方的铁质工具^[1]: (a) 约公元前 600 年希腊铁剪; (b) 约公元前 540 年中国陕西凤翔县南指挥村铁铲

自约公元前 3000 年逐渐进入繁荣铜器时代的中国萌生出中华文明, 并呈现出追求融合的文明特征^[3-4]。至东周晚期, 中国铁器已广泛地应用于农业生产。铁器虽然比铜器具有显著的性能优势, 但过于成熟的制铜技术和过于强大的铜器产量使得当时各诸侯国的军队装备了大量的铜兵器, 秦始皇也主要是借助铜兵器于公元前 221 年统一了中国^[1]。自此以后随着中华文明的率先崛起^[5], 追求统一以消除文明圈内纷争战乱成为了中华文明的重要特征^[6]。约公元前 1200 年古希腊的先民侵入迈锡尼地区并毁灭了迈锡尼文明^[4], 自此开启了古希腊乃至延续至今的西方文明。相对发达的社会生产力以及欠发达的铜器时代, 使得早期西方文明呈现出更倾向于对外扩张和征服的文明特征^[1,4,7]。随后, 冶铁技术从西亚传入古希腊和古罗马地区, 并以比西亚地区更快的速度发展成熟。自此, 古希腊、古罗马凭借领先的冶铁制铁技术频繁对外发动扩张战争, 大规模地占领土

地并夺得了大量财富和奴隶^[5,8]; 其间西方文明对外扩张掠夺以获取盘剥利益的特征得以不断增强^[4]。早期中国展示出发达而领先世界的铜器制造技术, 而西方早期则表现为相对于周边地区发达而先进的铁器制造技术, 因而促成了中西方文明的早期特征和差异。这对中西方文明的后续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

西周至宋元的中华文明

西周时期的分封制促进了不同族群的融合^[3,9]; 而其井田制虽然采用了具有等级差异和剥削特性的土地使用权制度, 但大体确保了耕者有其田, 避免了阶级矛盾的尖锐化^[10]。其间, 中国夏商周时期虽然存在少许奴隶, 但在以融合为主要特征的中原地区并没有形成奴隶社会^[3]; 因此当时中国社会也没有在精神寄托和抚慰方面产生巨大的需求, 也未能形成遍布全国的统一宗教^[1]。秦统一中国后, 普通平民之间大体平等, 都属于融合的华夏民族^[11]。随后的

汉朝政权剪除了所有割据的地方权力，平定了边患，借助张骞疏通了与西域各国的联系，构成了以朝代称呼命名的主体汉族^[9]并大量融合周边的部族而扩大了版图；由此形成了以汉族为主体的中华民族，并稳固了中华文明追求国家统一的特征^[3]。至蒙古人建立元朝统治后，蒙古、西藏地区也归入了中国的版图。经历了大禹治水至西周的一次融合高潮后^[3]，南北朝以及自南宋多国并列至元统一，中华民族又分别经历了第二次和第三次融合高潮^[12]。中华文明的融合特点使其发展过程中更多关注足够广阔的文明圈内的治理，追求统一、富足、稳定，而较少觊觎文明圈以外的领域^[1]。

基于周王朝所建立嫡、庶有序的宗法制^[3]，中央集权、皇权至上的制度确保了皇帝一人掌握了全部权力，因而也带来了先天的缺陷。首先，一切接近皇权的人和势力都会觊觎、进而掌控皇权，因此中国历史上反复上演着后宫干政、外戚专权、宦官乱政、权臣专制等多种形式的皇权旁落，甚至还导致了朝代的灭亡。其次，当皇权至上与嫡长子继承发生冲突时，后者会让位于前者，由此引发了频繁的储位之争或宫廷政变。再有，在皇权可指定继承人的情况下，则常会出现或故意制造嫡长子(或被指定人)年少无知，无法亲政，以致皇权旁落。中国统一后是一个巨大的国家，需要具有非凡的能力才能治理好，而血亲继承制无法保证继位的成年皇帝一定具有治理能力。他们或昏庸无能、或性情柔弱、或玩乐无度、或另有所好、或懈怠懒政等，这都会导致国政混乱或皇权旁落。掌握旁落皇权者往往重谋私利而无治国理念。中国历史上各朝代在皇位更迭过程中频繁发生乱政现象，涉及数十起后宫、宦官、权臣、外戚导致的皇权旁落，以及因皇帝施政不当或懒政造成的混乱和朝代灭亡的情况。其中频繁出现故意安排无亲政能力的年少皇帝继位而造成皇权旁落。由此说明，中央集权、皇权至上的制度中确实蕴藏着不稳定性。

公元前6世纪至前3世纪东周春秋战国时期，出现了一大批专门从事探索世界观和相关社会规则的思想家、哲学家、教育家。东周春秋战国时期诸侯国因利益冲突相互征战不止，频发争霸战争。当时以儒家思想著称的孔子和孟子虽然认可人们对利

益的追求，但主张这种追求应该置于道德规范的约束之下。同时孔孟还主张应淡薄利益诉求，任何对“利”的追求都应遵从于“义”，即其行为应在特定政治伦理，或称“礼”的约束之下^[13-15]。孔孟及其儒家学派在道德、伦理、哲学、教育、个人修为、社会关系、政治理念等一系列方面都提出了自己的理论，对中国社会及思想理念的演变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儒家的治理观念呈现了显著的“德治”特征。中国的东周时期，各诸侯国之间征战讨伐经常会导致一些强国吞并了与之对抗的弱国，使弱国灭亡。鉴于这种激烈竞争以求生存和发展的局面，各国君主都努力寻找或培养能够帮助他们富国图强的贤能人才。当时著名的“稷下学宫”为此培养了大量的人才，包括：儒家、道家、法家、名家、兵家、农家、墨家、方技家、阴阳家、纵横家等多种持不同理念的学者^[16]。许多稷下学者自由地于各诸侯国之间奔波游走，被各国国君所聘用。其中，墨家主张“平等”、“博爱”，以“互利”引导人的逐利本性^[17]；道家主张尊重自然规律，不要过度干预，因而推崇“自然”、“无为”、“自由”等理念^[18]；阴阳家以五行为变量建立了观察世界、探索客观规律的辩证思维体系^[19]；这些都丰富了中华文明的思想内涵。然而在竞争激烈的春秋战国时期得到广泛认可并在强国策略上获得巨大成功的是秉持法家思想的大批政治家。法家秉持以“平等”、“公正”、“诚信”为基础借助“法治”而追求“富强”^[20]。战国时期秦孝公重用法家的高鞅，主持国家变法图强，致使秦国迅速强大，为秦国最终统一中国奠定了坚实的基础^[1]。由此可见，“法治”是春秋战国时期主导性的治国理念。

秦始皇统一中国、建立了大一统的中央集权政体之后，儒家“德治”思想获得了真正的发展机会。公元前134年汉武帝采纳儒士董仲舒的建议，开始以儒学思想体系治理国家^[21]。至宋明时期儒学被进一步细化和完善为“程朱理学”^[22]，一切社会精英和政府官员都要熟读“四书”、“五经”，必须掌握和接受儒学的意识形态。儒学思想体系为中华文明建立并完善了伦理、道德、思想、社会秩序、乃至政治构架等多方面综合系统，其“仁”、“义”、“礼”等观念也一定程度地发挥了西方文明中宗教所起的教化作用，对促进文化发展、稳定中国社会发挥了关键作

用,并进一步强化了中华文明融合、统一的特征。儒学的治理理念,对社会底层的强制约束力很大,而对社会顶层的约束性约束力则很弱,这非常有利于中央集权、皇权专制下的政府治理。同时,儒学思想着眼于维护现有社会秩序和阶层差异,因而呈现出内敛、守旧、僵化、固步自封等特征,严重抑制了社会的开拓创新和外延发展。

儒学对人性逐利的倾向以堵塞为主实施教化,导致那些饱受儒学熏陶、身居高位、较少受到儒学理念强制约束的官僚往往呈现出虚伪的特性,集中表现在中国历史上那些著名的佞臣贪官身上。北宋蔡京、南宋秦桧、明朝严嵩等各个熟读儒学经典和四书五经,满腹经纶,均二十几岁中进士,官拜宰相。他们纵容引诱宋徽宗玩乐、曲意迎合宋高宗、取悦讨好嘉靖帝,从而获得帝王庇护,得以长期独断专横、败坏朝政、贪污敛财。清朝的和珅也熟读四书五经,历任军机大臣、步军统领、理藩院尚书、文华殿大学士等要职,善于揣度和迎合乾隆帝心意,并赢得皇帝欢心,任内贪污受贿、巧取豪夺、富可敌国。蔡京、秦桧、严嵩、和珅,个个聪明伶俐,深谙儒学经典和皇权专制下的为官之道。儒学要求臣民忠于至高无上的皇帝,只要作好迎合与蒙蔽的功课,亦可借得皇帝的至高权力,在饱学儒士外壳的遮挡下肆无忌惮地满足自己逐利的欲念。这种行为虽为儒学所反对,但儒学支撑的皇权制度却无法阻止。儒学制度同样无法阻止中国历史上后宫、外戚、权臣、宦官等篡夺皇权而腐败、乱政的现象。

需要注意的是,由于中华文明鲜明的融合特征^[3],自西周以来在中国历史上的致力于统一的主干民族虽经常需要抵御外来民族的侵扰和杀戮,但从未出现过对其他少数民族或外族大规模种族灭绝的行为。具有强大军力的郑和船队在15世纪初的下西洋过程中对沿岸国家和人民始终是友善相待、公平贸易,从未有过征服、掠夺、屠杀、奴役等行为^[23]。诸如建立元朝的蒙古族、建立清朝的满族等少数民族,一旦融入中华民族,其原有的种族灭绝行为即会逐渐消失。中国历史上频繁的大规模农民起义表明,社会内部的对立主要基于阶层间的矛盾,明显有别于西方社会。

古希腊至中世纪的欧洲文明

古希腊、古罗马借助其在欧洲领先的铁兵器优势征服了广大地区,建立起了庞大的奴隶社会^[5]。在掠夺财富以及捕获和贩卖奴隶获利之外,随着统治领域的扩大罗马还广泛地以行省制度治理被征服地区,借以支撑不断扩张和频繁战争所需的财税和赋役负担。至征服版图鼎盛时期行省数目达到五十几个,后期甚至划分成上百个行省^[24]。罗马在各行省驻扎军队,并委派总督统治以每年收取大量的赋税,征调大量徭役^[25]。罗马帝国时期,非人的奴隶制度和残暴统治遭到了奴隶们的反抗,但奴隶们频繁的暴动和起义都遭到了残酷镇压。反抗无望的大量奴隶只能寻求精神安慰和寄托,这为基督教作为统一的宗教在欧洲的发展奠定了广泛的基础。随后,基督教的教徒成分变得多元化,且扩展到上层和富裕阶层。公元476年西罗马帝国灭亡,帝国疆域很快分裂成多个不同的国家,但统一的基督教以跨越国家疆界的形式保留了下来,成为西方文明重要的组成部分^[1]。

公元前5世纪至前4世纪欧洲古希腊时期出现了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众多思想家、哲学家、教育家。古希腊的社会尚以奴隶制经济为主,城邦间掠夺征伐战争不断,公民及城邦利益的扩大化是主流社会的基本诉求。古希腊的思想家认为,国家利益比公民个人平等更为重要,理想的治国手段是道德教化^[26],即应该以正义、公道、中庸、善、幸福等伦理思想和道德原则等“德治”准则作为治理国家的思想^[27]。苏格拉底向希腊社会提出了合理的伦理与道德观念,希望人们辨别善恶、主张正义、能奉献社会^[13]。柏拉图向人们展示了物质世界之外的精神世界,希望人们具备良好的品德,处事公平,与人为善^[14]。亚里士多德强调了理性的重要,在道德社会里还要遵循民主与法治等原则^[15]。可见他们虽然认为追求利益要符合道德和法规约束,且不可过度片面追求以及损人利己地追求,但所追求的利益是指其文明圈里包括获取奴隶在内的利益。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人的哲学思想成为了欧洲哲学发展的基础。可以发现,西方早期思想对其文明圈内、外,即公民与奴隶事物的

观察已呈现出了双重标准的特征。公元前 445 年古罗马通过平民可与贵族通婚、可平等选举官员的法案，公元前 287 年通过承认平民议会议案可成为正式法律的法案等，以协调贵族和平民的关系^[27]。由此，古罗马主要治理特征由“德治”逐渐向“法治”演变^[26]。

从西罗马帝国灭亡的公元 5 世纪至 15 世纪的约一千年是西欧的“中世纪”。此时王族、贵族、平民等一切社会成员基本都信奉基督教。基督教会具有管理一切的权威，《圣经》是国家统治的理论基础和判断善恶是非的标准，上帝是一切权威的最初来源。自此，国家治理就从罗马时期的“法治”转为中世纪的“神治”^[26]。基督教的各级教士处于思想文化领域的垄断地位，基督教的神学至高无上，除此之外再不允许存在其他的政治理念。神学包含了诸如哲学、政治学、法学、伦理学、美学等一切科学，也垄断了教育和所有学术研究。诸如国家、政体、主权、法律、服从、义务等一切政治概念都只能在神学体系内探讨。由此可见，尽管西欧出现了众多政权，基督教会是保持西方文明整体性和体制化的核心力量。维持教会的运作不可避免地需要获得足够的财政支撑。各地教会和主教们作为世俗社会中强大的地方势力占有大量土地，且可向信徒收税或借助各种宗教活动收取钱财。到 6 世纪，欧洲教会规定每个教徒有义务向教会交纳什一税，即教徒需将收入的十分之一缴纳给教会^[28]。基于全民信教，教会可借助什一税获得丰厚的经济收入。教会所积累的地产以及所实施的司法裁判也为教会提供了稳定的收入。教会的这些收入以及教会具有收取税费的权力逐渐成了其腐败和贪婪的温床^[29]。为了获取额外钱财，自 14 世纪起历任教皇都曾大量印制各种赎罪券并沿街叫卖，称教徒购买赎罪券后其所犯罪过可以得到赦免、死后灵魂可升天堂；甚至制定了“赎罪券价目表”，8 个金币可赦免杀人罪、6 个金币可赦免通奸罪等。1517 年教皇利奥十世大量发行赎罪券以筹款重建圣彼得大教堂，同时还将 39 个红衣主教的职位出售^[30]。可见，红衣主教是一个值得花钱购买并可以获得更高回报的职位，由此导致教会职务成了获取财富的途径。教会世俗化引发的这些腐化、堕落行为严重地冲击了教会的神圣形象。教

权与王权共存的局面必然导致二者的矛盾。1075 年教皇格里高利七世主张教权高于王权，教皇和教会应掌握主教叙任权、立法权、司法权等众多世俗权力，甚至有权力废黜世俗皇权和王权^[26]；由此发生了教皇格里高利七世与德意志国王亨利四世的争斗和互相废黜^[31]。频繁出现的教权与王权的矛盾，造成教权成为制约王权的重要力量^[1]。

在基督教文明中平等与博爱是非常重要的宗教理念，也是基督教成立和发展的核心驱动力之一；因此基督教基于对上帝选民平等与博爱的理念，确立了“上帝面前人人平等”的基本原则。然而这一原则也同时意味着非基督教族群并不能获得相应的平等地位，而且还会成为西方社会继续获取盘剥利益的征服对象^[6]。这类征服往往表现为掠夺、奴役、欺骗、威胁、恐吓、榨取、勒索、盘剥、侵占、驱赶、虐杀、种族灭绝等行为。可见古希腊早期文明思想中双重标准特征得到了延续。为实现征服目的，西方社会往往会追求跨越文明范围或跨越控制领域的霸权。1095 年教皇乌尔班二世呼吁基督教停止一切内部冲突，把矛头指向穆斯林，鼓动欧洲各地的基督徒组成十字军东征，并保证说：“参与圣战，你们必将清洗你们的罪，必将沐浴天国神圣的光辉。”基督徒们不再需要为所犯罪过忏悔，并被要求通过展现武艺来得到救赎^[6]。这种狂热的鼓动表明当时的基督教并没有把其他宗教的教徒看作是需要平等对待的族群，基督教的一切文明理性原则对于异教徒都失去约束^[32]。1099 年十字军第一次东征攻克耶路撒冷，并展开了残酷的劫掠和屠杀。历史上曾多次出现这种残暴的十字军行为。

中世纪欧洲宗教神学占据思想领域统治地位时期，天主教的教义成为了人们惟一可以接受的指导思想，任何学说理念都必须符合宗教教义，其他理念一概都被视为异教邪说。当时的科学教育往往是为了解释、论证和美化基督教神学。因涉嫌违反教义 1210 年古希腊学者亚里士多德的哲学著作遭到教会禁止，尽管亚里士多德是基督教出现之前的历史人物^[33]。在利益驱动下古希腊、古罗马成功的扩张征服行为也造就了西方文明中开拓、创新、积极探索未知世界的特性，并推动了欧洲在科学技术上的活跃发展。然而，这些探索往往会突破教会所主张

的种种源于宗教的理念，强烈冲击教会的权威地位，因此遭到了教会强烈的压制和惩处。波兰天文学家哥白尼研究发现地球不是宇宙的中心，提出“日心说”并在去世前的1540年出书《天体运行论》加以阐述。此说违背教义，但哥白尼很快去世，天主教未来得及处罚。意大利天主教学者布鲁诺不仅出版著作支持哥白尼的观点而且进一步阐述说太阳也不是宇宙的中心，因而于1600年被天主教判处火刑，在罗马鲜花广场被烧死；意大利教授伽利略也因支持哥白尼的日心说于1633年被判处终身监禁^[34]。西班牙医生塞尔维特1553年秘密出版了《基督教的复兴》一书，因阐述了与天主教所持教义不同的人体血液流通理论而被判处火刑，并于当年被烧死在日内瓦的火刑柱；同期有类似叛逆行为的英国医生哈维因其国王御医的身份才逃过处罚^[33]。人们一方面看到教会的专制、腐朽，同时又必须禁锢在教会允许的思想理念之内，漫无边际地自我检讨和救赎。

西罗马帝国解体后出现了各种日耳曼族群组建的独立国家。新国王们向帮助他们登上王位的臣属分发土地进而建立了附庸采邑制，并以所收取的农业税作为主要的财政资源^[35]。封地获得者成为了各王国内不同层次的贵族，他们必须对分封土地的君主负担一定的责任和义务，包括提供兵役力量和赋税等^[36]。在附庸采邑制的执行过程中奴隶数量不断减少，奴隶制也逐渐走向灭亡。王国内的大贵族们对国家重大事务的决策甚至王位由谁及如何来世袭继承等问题都有一定的影响^[31]；因此王权往往会受到大贵族的很大制约。中世纪初期的附庸采邑契约使得欧洲各个王国类似于松散连接的共同体，这只适于生产力水平较低的小农经济。当生产力发展而商品经济兴起并要求广阔市场、国家发展呼唤强势王权、与外国竞争需要具备高强度战争能力时，附庸采邑制就变得无法适应。随着西欧各国间的战争规模不断扩大，带有传统民主色彩的松散君主制就逐渐转变为专制的君主制。国王的军队从征集附庸们的协助和帮从转为国王直接统帅、且直接效忠于国王的常备军；同时国家经济转为统一的市场经济，政治权利也转向国王的中央集权。自14世纪开始，王国内的中央集权逐渐成为西欧政权演变的普

遍趋势^[26]。1438年和1532年法国国王查理七世和英国国王亨利八世分别颁布国务诏书，宣布脱离罗马教会，确立本国宗教的独立地位，加强王权。西班牙则以与罗马教廷结成牢固同盟的形式加强了王权。16世纪的英国、法国、西班牙已经具备了王权专制的政治形态，到中世纪末期教权衰落而王权有所加强^[26]。

古希腊亚历山大东征时不仅掠夺财富和奴隶，而且也大肆屠杀敢于抵抗的居民；古罗马时四处征伐的军队更是随处洗劫城市并屠杀居民^[11]。中世纪时期基督教鼓动了十几次主要针对穆斯林地区的十字军东征，在耶路撒冷和君士坦丁堡都实施了灭绝性屠杀^[32]；但在此期间鲜有底层民众对统治者的大规模起义抗争。自15世纪哥伦布发现美洲新大陆起，西方国家在全世界推动海外殖民扩张，不仅使得美洲和澳洲的土著居民遭受了灭顶之灾^[23]，而且也使得非洲和亚洲广大地区的居民遭受了巨大的苦难^[5-6]。由此可见，在西方文明历史中种族灭绝是一种持续的常见行为，西方社会中呈现的往往是强势族群与被征服族群之间更为突出的矛盾。

突破中世纪羁绊与孕育工业革命

西罗马帝国分裂成众多的君主制国家后，在基督教的覆盖下欧洲进入了约千年的中世纪时代。其间，获封土地的贵族掌握了很大权利，国王需向贵族收取税赋和徭役，造成了国王对贵族的依赖。因而，欧洲呈现着基督教权、众多王权和各国贵族权并存且互相制约的现象，没有任何一个权力能够在欧洲独断专行。然而，基督教毕竟是一个跨越国界而覆盖欧洲的势力，由于全民信教，教会在意识形态方面始终发挥着主导人们思想的作用。16世纪，哥白尼、布鲁诺、伽利略、塞尔维特等因探索、发布或认可了与天主教教义不符的科学知识，而遭到了教会的严厉处罚^[34]。同时，教会却借助各种税收、销售“赎罪卷”、出售红衣主教职位等方式大肆敛财^[30]。到中世纪晚期，教会越来越专制、贪婪、腐败，同时人们又必须禁锢在教会允许的思想理念之内，个性和自由长期受到极大的压制，这种状况与西方文明的探索、开拓、创新等传统格格不入。

自15世纪，意大利率先尝试重新发掘古希腊、

古罗马的文化艺术，推动与天主教经文有所差异的思想文化的发展。在美丽艺术外衣的遮盖下，逐步扩大的文艺复兴运动巧妙地突破了天主教的藩篱，因而得以借助开启欧洲文艺复兴运动来突破中世纪的羁绊。之后的数百年间，文艺复兴成为了整个欧洲不可阻挡的潮流，极大地推进了尊重人性和个性自由的理念，使得人们的思想意识获得了空前的解放^[34]，冲击了当时天主教所坚持的专制而腐朽的观念和制度。14世纪英国神学家约翰·威克里夫强烈反对教会的敛财和腐败行为，并提出“神恩统治论”，认为人与神的沟通并不需要教会和教士的中介作用^[37]。1517年当教皇宣布大量发行赎罪券时，遭到德意志帝国天主教神父马丁·路德强烈的指责^[29]。教皇无法直接控制威克里夫所在的英国和路德所在的德意志帝国，其对威克里夫和路德的处罚措施也无法实施。马丁·路德的立场逐渐得到广泛接受，德意志帝国广大地区开始改革教会，所组建的新教教派从天主教中分离出来，进而形成了以新教运动为特征的宗教改革。1529年英格兰国王亨利八世因离婚问题与教皇闹翻，遂指使国会宣布英国脱离罗马教廷，并废除赎罪、朝圣等活动，其改革的内容与欧洲大陆的宗教改革没有太大差异^[29]。这些宗教改革行为努力摆脱天主教专制管制、摒除了多种原有弊端、减轻了教徒的负担、解开了思想束缚，为欧洲后续的跨越式发展扫除了宗教理念和精神上的障碍。英国的洛克以财产私有为核心于1689年出版著作《政府论》，驳斥了君权神授的观点和理论^[38]。法国的孟德斯鸠和卢梭分别于1748年和1755年发表著作《法的精神》和《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卢梭认为自由、平等是人类的天赋人权，孟德斯鸠则提出了“三权分立”理论，即是将国家权力分为立法权、行政权和司法权，将三种权力分别交给国会、政府和法院管辖，既保持各自的权限，又要相互制约保持平衡^[39]。由此推动了欧洲的思想启蒙运动。英国的亚当·斯密于1776年出版《国富论》，探讨并论证了资本主义社会自由竞争阶段经济自由主义的必然性^[40]。

中世纪各君主制国家中借助不同形式贵族会议来体现贵族的权力，并影响各王国的重大决策，体现出古罗马时期原有贵族民主传统的某种传承^[41]。

13世纪初，贵族们基于强烈不满而迫使英王约翰一世于1215年签署了“大宪章”，不仅增强了贵族的决策权和影响力，而且还把国王置于贵族的监督之下^[29]。同一时期，德意志国王腓特烈一世、西班牙莱昂国王阿方索九世、匈牙利国王安德鲁二世等也分别于1183年、1188年、1222年承诺给予其贵族和臣民更多的权力^[29]。1295年为顺利地各阶层臣民筹集额外税款，英王爱德华一世召集贵族、教士、各郡骑士、各城市市民等方面代表约400余人组成新议会开会，其中骑士、市民则由郡守主持的选举产生^[42]。这是欧洲历史上出现最早的包括市民阶层的议会。因臣民数量巨大，市民阶层只能选若干代表参加，以“代议制”的形式表达市民意见。代议制的出现、完善与成熟是近代西方民主政治发展的关键环节^[43]。1689年英国议会颁布《权利法案》限定了君主的职能和权力，由此英国开始实行君主“立宪”制^[29]。此时欧洲的法国、西班牙等国都有不同形式的议会。在启蒙运动用科学批判神学、用人权反对专制思想的推动下1789年法国制宪议会颁布《人权宣言》，随即爆发法国大革命运动；经历了多次反复地与王权激烈较量后，1870年法国最终确立了共和政体。因教派、国家、利益集团、族群之间频繁战争和由此造成的动荡和损伤，以及因西方文明传承而导致的民族、文化、宗教、利益诉求等多方面的差异，各国因而逐渐认识到在欧洲很难形成一方独大的国家形态^[29]。

中世纪基督教的神学至高无上，神学包含了诸如哲学、政治学、法学、伦理学、美学等一切科学。为了培养教会和世俗社会所需的各方面人才，中世纪的欧洲出现了很多著名的大学，如11世纪中期在意大利南部成立的以医学为主要特征的萨莱诺大学和在意大利北部成立的以法学为主要特征的博洛尼亚大学，分别于1168年和1209年在英国建立的剑桥大学和牛津大学，13世纪中期在法国获得大学身份的巴黎大学，分别于1358年和1388年在德国建立的海德堡大学和科隆大学等等^[44]。这些大学往往主张学术自由并尽力与教会的干扰周旋，推动了知识的传播和世俗化；进而在数学、物理学、化学、医学、天文学、地学、多种技术科学等各自然科学的众多领域都取得了大量创新性进展^[44]。例

如，剑桥大学的牛顿与 1687 年出版了“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一书，从而建立了完美的经典力学理论^[45]。中世纪的这些科技进步及其对未知世界的不断探索为西方引领世界的技术创新和随后爆发的工业革命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其间，由哥伦布率先发起的海外扩张活动推动了大航海时代的到来，欧洲人的足迹遍布世界各地，为工业革命的发展攫取了原料、市场和广阔的发展空间^[23]。

总之，欧洲各国此起彼伏地出现了难以制约的文艺复兴运动、宗教改革运动、启蒙运动；这种良性竞争、互相促进方式逐步突破了基督教传统神学思想的桎梏和各方面的藩篱。随后借助政体改革、科技创新、海外扩张等造成了获取巨大利益的发展空间，新技术发明者在利益驱动下通过一系列技术发明大幅度地提高生产效率、降低劳动强度，从而引发了英国工业革命，自此西方开始引领世界近代历史的发展。

分析显示，文明思想中所存在的扩张、盘剥等特征导致了西方社会针对文明圈内、外的双重价值观^[7]。同时，探索创新精神和所引发的工业革命也导致西方科技领先、经济发达、军事称霸、国家强盛；进而得以继续维持其扩张、盘剥利益。工业革命以来世界其他文明积极向西方学习，乃至向往西方。学习和汲取西方先进思想是积极变革的行为，但向往就难免导致盲目性。为维持在全世界的主导地位，西方社会经常向其他文明和文化地区宣传和推行其圈内价值观和相关社会制度，但刻意避免涉及其圈外价值观和由此导致的价值双重标准^[7]。那些照搬西方制度的非西方国家和地区，或在经济、军事、政治诸方面受制于西方国家而不能完全独立，或因无法对外扩张盘剥而显著改变了西方的理念即首先以非西方的模式发展经济和科技，或始终不能摆脱贫困和落后的地位，或难以实现西方社会那种稳定的政治格局。迄今为止尚未见有不受西方管控而完全独立的非西方国家，能够借助照搬西方制度而成功地发展出本质上与西方国家完全一致的社会。因为这些国家未曾有过、且短时间内也很难完全具备，西方社会基于其几千年文明历史的积淀而形成的扩张盘剥等各种特征的文明背景和相应的思想文化传统^[4-7]。目前，虽然西方在向其他地区宣传

和推行其制度和观念时屡遭失败，但世界上仍有一些非传统西方文明范围内的国家和地区盲目地期待借助照搬西方制度而快速实现经济、科技和军事等诸方面的强大和族群的兴盛；并未清醒地认识到，目前已经不再有历史上西方文明借助扩张盘剥而强盛的那种国际社会环境^[4-6]。另外也需警惕，尚残留扩张盘剥利益诉求的某些西方国家会刻意利用这种盲目照搬所附带产生的附庸效应达成自己难以单独实现的利益目标。

结束语

在传统铁器时代，中西方文明的早期特征得到了延续和深入发展。自约公元前 3000 年借助发达的铜器技术而兴盛的早期中华文明呈现了融合和统一的特征，且未出现统一的宗教。春秋时期的诸子百家建立了丰富的中华文明思想内涵，其中儒家的思想体系更适合后续中央集权巨大国家的治理和统治，在历史中不断充实，到南宋形成了更加完善且细致入微的程朱理学，为中国社会构建了思想理念和道德规范；但其因循守旧、排斥创新的倾向也制约了社会的进步与发展。其间中华文明的对外关系表现为以张骞通西域和郑和下西洋为代表的，追求与周边地区合作、交流、共命运、协调发展的策略。

萌生自约公元前 1200 年，随后借助先进而发达的铁器技术而兴盛的早期西方文明建立了庞大的奴隶制社会，并展现出扩张和盘剥的特征。这种特征也培育了西方开拓、进取、创新的文明精神。自古希腊时期起，西方的思想家就建立了平等、民主、法治等社会理念和价值观，但这都以西方文明圈为限，否认其文明圈以外族群的同等权利；因此，西方文明的价值观同时展现出了对其文明圈内外双重标准的特征。强大的奴隶制为基督教在西方文明圈的广泛蔓延提供了坚实的基础。罗马非融合性扩张强权的终结导致了西方众多王权林立，难以形成统一的政权，且教权、王权、贵族权长期互相制约、争斗。上千年的中世纪时期欧洲以基督教文明圈为界限、以歧视和盘剥非基督教世界为特征，延续了西方对外扩张、盘剥的文明特征。这种特征表现为对外的十字军东征以及以哥伦布的探险活动为代表的海外殖民扩张。其间，宗教神学占据了思想领域

的统治地位，严重制约了思想的自由和科技的发展，并造成了基督教的腐败和衰落。西方开拓、创新等文明精神推动了欧洲的文艺复兴、宗教改革、思想启蒙、政体改革、科技创新、海外扩张，并为工业革命的爆发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西方扩张征服等特征也导致其历史上经常发生对异族的大规模种族灭绝行为，且往往也以这种观念理解其他文明对待异族的心态。

参考文献

- [1] 毛卫民. 材料与文明. 北京: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9
- [2] 陈建立, 毛瑞林, 王辉, 等. 甘肃临潭磨沟寺洼文化墓葬出土铁器与中国冶铁技术起源. 文物, 2012(8): 45
- [3] 毛卫民, 王开平. 繁荣的铜器时代与中华文明融合统一的特征. 金属世界, 2021(6): 1
- [4] 毛卫民, 王开平. 铜器与中西方文明的萌生. 金属世界, 2020(4): 1
- [5] 毛卫民, 王开平. 金属与中西方文明的崛起. 金属世界, 2020(6): 1
- [6] 毛卫民. 金属与战争陷阱. 金属世界, 2021(2): 1
- [7] 毛卫民, 王开平. 欠发达铜器时代孕育的西方文明及其早期价值观念的特征. 金属世界, 2021(5): 1
- [8] 克里斯普P. 古罗马史. 苏扬, 张天译. 第二版. 北京: 科学普及出版社, 2013
- [9] 张肇麟. 夏商周起源考证. 北京: 科学出版社, 2018
- [10] 晁福林. 夏商西周的社会变迁.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0
- [11] 刘家合, 王敦书. 世界史古代史篇, 上卷. 北京: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1
- [12] 关汉华. 中国历史上的民族融合与社会发展. 历史教学问题, 2009(2): 38
- [13] 马涛. 孔子与苏格拉底经济思想特点的比较. 武汉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8, 20(3): 290
- [14] 焦唤芝. 孔子与柏拉图财富观之伦理视域的比较. 安徽职业技术学院学报, 2014, 13(2): 23
- [15] 武岑. 孟子与亚里士多德的政治生态思想比较. 重庆科技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7(11): 11
- [16] 阮芬. 稷下学宫的先生与柏拉图学园的教师之比较. 管子学刊, 2019(4): 41
- [17] 吴进安. 墨子社会正义观探析. 职大学报, 2017(6): 1
- [18] 刘建涛. 道统文化的神圣追求: 实现精神自由. 大连海事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6, 15(5): 76
- [19] 王巳龙. 阴阳家兴衰中的民族文化选择. 开封教育学院学报, 2016, 36(9): 22
- [20] 周四丁, 蒋瑀. 论非法治学说的价值系统. 湖南人文科技学院学报, 2019, 36(3): 1
- [21] 韩星. 董仲舒以经学为基础构建儒学思想体系. 衡水学院学报, 2019, 21(2): 17
- [22] 翟奎凤. 经学与理学之历史及儒学未来. 江西社会科学, 2015(3): 5
- [23] 毛卫民. 铜器时代起源以来中西文明的海外拓展特征. 金属世界, 2021(1): 5
- [24] 徐国. 行省→省(郡)→总督区→军区-罗马帝国行政区划的变迁及其意义. 苏州大学学报(哲学版), 2014(1): 49
- [25] 宫秀华, 孙敏. 略论罗马国家对行省的盘剥. 东北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4(2): 35
- [26] 张桂林. 西方政治思想史. 北京: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9
- [27] 叶立焯, 郝宇青. 西方政治思想史. 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7
- [28] 雍正江. 中世纪西欧的什一税. 世界宗教文化, 2007(4): 25
- [29] 史蒂文森 J. 欧洲史. 李幼萍, 刘嘉琪, 张源, 等译. 广州: 南方日报出版社, 2018
- [30] 唐中华. 利奥十世: 美第奇家族的首位罗马教皇. 世界文化, 2018(11): 9
- [31] 郑寅达. 德国史.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4
- [32] 本内斯 J M, 霍利斯特 C W. 欧洲中世纪史. 杨宁, 李韵译. 第10版. 上海: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2007
- [33] 新乔, 赵晓宁, 任熙俊. 近代科学教育的兴起与发展. 中国教育技术装备, 2019(1): 1
- [34] 钱时惕. 为摆脱神权统治而斗争的科学家-科学发展的人文历程漫话之六. 物理通报, 2011(8): 112
- [35] 徐浩. 欧洲中世纪领主与农民的收入变化. 经济社会史评论, 2017(4): 4
- [36] 赵立行. 中世纪政治中的契约观念-论附庸采邑制. 历史教学问题, 2013(5): 12
- [37] 王任傅. 《威克里夫圣经》译者考辨及其文学史意义. 世界宗教文化, 2016(4): 88
- [38] 魏官正, 于潇哲. 论洛克《政府论》所体现的政治理论及其内在逻辑. 现代交际, 2020(3): 246
- [39] 王喆. 论三权分立和主权在民. 法制博览, 2018(11): 44
- [40] 时越. 浅谈《国富论》与18世纪的英国社会. 新西部, 2017(34): 101
- [41] 安长春. 中国王权与西欧国家王权之比较. 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 2009, 62(5): 602
- [42] 王运红. 议会之母-英国议会的起源. 海南广播电视大学学报, 2004(2): 37
- [43] 邹旭怡. 西欧中世纪形成的代议制传统及其现代转化. 传承, 2008(8): 118
- [44] 陈吉明. 科学技术简史. 北京: 科学出版社, 2015
- [45] 张岚, 王欣. 哈雷与牛顿的《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 物理, 2020(12): 810

作者简介: 毛卫民(1950—), 男, 北京科技大学退休教师, 《金属世界》特邀撰稿人。曾长期开展材料基本原理和应用技术的研究, 现从事材料技术进步与人类社会发

展内在联系的分析, 著有《材料与人类社会》《材料与文明》等。通信地址: 100083 北京海淀区学院路30号北京科技大学材料系, E-mail: wmmao@ustb.edu.cn。